

试论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 (1958—1963)

叶 晓 东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叶晓东(1976-), 男, 广东汕尾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近代以来的德国与整体世界研究。

[摘 要]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 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之间, 在解决危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阿登纳政府主要采取影响西方盟国决策的方式来参与危机的解决, 在事实上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最终否决权。阿登纳政府的首要目标是, 不能让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 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取得了成效。

[关键词] 阿登纳政府; 第二次柏林危机; 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 K51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75-06

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 西方阵营内部对于解决危机存在着分歧, 联邦德国的立场最为强硬, 法国采取了大体上支持联邦德国的立场, 而英国和美国则愿意妥协。阿登纳政府反对英国和美国的妥协倾向, 以不让盟国以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为代价, 与苏联达成妥协。本文通过考察阿登纳政府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主要政策及其根源, 对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进行评价。

—

德国问题是战后欧洲问题的核心, 而柏林问题又是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热点。冷战高潮时期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 两大阵营有关国家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动向, 常常在柏林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西柏林的现存状况使双方都不满意, 这座城市经常是东西方在欧洲的紧张局势的爆发现。”^[1] (第257页)

分裂的柏林, 对于阿登纳来说, 代表着统一的希望。首先, 柏林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二战以来德国问题的未解决, 也就意味着对德国分裂的否定, 保证了联邦德国对德国的“单独代表权”和对民主德国的不承认。其次, 柏林问题的存在也意味着联邦德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追求的现实合理性和可能性。柏林问题从国际法角度上意味着德国被占领状态没有终结, 美、英、法、苏四大国对德国问题的解决负有责任和义务, 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在四大国协商下解决, 而不是某一国所能解决的。再次, 柏林问题的存在对于统一的意义还在于, 在《基本法》的规定中, 它将是未来重新统一后德国的首都。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时候, 波恩只是作为联邦德国的临时首都, 一旦德国重新统一, 就将迁都柏林。最后, 一个繁荣的西柏林在阿登纳看来, 是“自由制度”优越性的展示窗口, 会对生活在“专制”下的民主德国人产生吸引力, 从而产生促进统一的作用。

正因为柏林问题对德国重新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从联邦德国成立之时起,阿登纳就拒绝了将西柏林完全合并到联邦德国的建议,而是使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西柏林虽然不参加联邦选举,但直接根据市议会党派大小选派22名代表参加联邦议会,被选派的议员同联邦议院其他议员一样享有同等权利。由于西柏林处于民主德国中心被隔绝的位置,联邦德国政府每年以大量的补贴予以支援,才得以维持其生存。西柏林与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使得西柏林的居民认为他们当然应该属于联邦德国的一部分^[2](第416页)。

在安全上,西柏林则依赖于西方三大国的保护。1954年10月3日,美、英、法三大国发表伦敦宣言,该宣言声称,柏林的三大西方保护国“认为对柏林的侵犯,不管它来自何方,都是对它们的武装力量和它们自己的侵犯”。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提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共同占领柏林的现状,从而拉开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序幕。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及联邦德国等其它有关国家政府,要求在6个月内各国撤走驻军,把西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提出如果6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苏联将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在阿登纳看来,这是一个语气强硬的最后通牒,按照阿登纳的判断,最后通牒的首要目的是要取得西方国家对民主德国的承认。不仅如此,苏联还试图把联邦德国从西方阵营中分离出去。阿登纳感到与盟国进行紧密磋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很明显,如果没有我们的盟国,我们在苏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3](第546页)

由上可知,在阿登纳的外交政策中,柏林问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柏林问题是与德国问题特别是德国的重新统一密切相关。对战后德国与西方联盟的关系而言,柏林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西方国家保卫该城义务的一种考验,更是西方三大国政策可信度的试金石。

二

在危机期间,阿登纳政府与西方三大国之间保持了密切的接触。阿登纳政府通过影响西方三大国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在盟国内部贯彻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立场和原则——防止西方盟国以牺牲联邦德国利益为代价与苏联达成妥协。为此,阿登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一)要求盟国承担主要责任

阿登纳政府认为,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主要是针对西方三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有关柏林及其通道的冲突中出现在第一线的,不应该是联邦德国政府。而且,鉴于柏林特殊的法律地位,因而柏林及其通道的安全,纯属三大国负责的范围。

阿登纳向盟国领导人分析了局势的危险性,敦促他们采取行动。1958年11月21日,阿登纳写信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要求麦克米伦运用英国政府的影响力,与苏联进行交涉,向苏联指出取消柏林现有地位的灾难性后果。之所以向麦克米伦发出呼吁,是因为“我感到不仅对德国人民负有责任,我们大家还对全世界各国人民负有责任”^[4](第559-560页)。在法国总统戴高乐于1958年11月访问德国期间,阿登纳向戴高乐表达了他对柏林局势的担忧,希望法国采取行动。戴高乐反对对柏林现状作任何改变,表示要坚决顶住苏联试图片面改变西柏林地位的压力,这让阿登纳感到安心^[5](第159页)。美国是西方阵营中的盟主,阿登纳担心美国是否会注意到局势的危险性。阿登纳把对局势的分析,写成了一份报告,在杜勒斯预定1959年2月7日访问联邦德国之前送交他,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在这份报告中,阿登纳指出,苏联在柏林问题上做文章,其主要针对对象是美国。“假如有人——如特别在美国,但也在英国所出现的那样——在判断当前由苏联人引起的局势时,仅仅从分割德国的观点出发,那是不正确的,同时也因而会得出错误的看法。分割德国不是原因,而是在分割之前早已存在的苏美之间紧张局势的结果。”^[3](第548-549页)

阿登纳希望盟国负起主要责任还表现在他对西方三大国的军事应急计划的态度上。阿登纳认为,联

邦德国军队不应该参加解除柏林通道封锁的行动, 保护柏林是西方三大国的责任, 如果西方三个保证国在履行保护柏林的责任时卷入军事行动, 那将意味着是“北约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联邦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才可以以履行它对北约承担义务的名义, 动用国防军介入军事行动。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观点表达了阿登纳政府的立场: “我的观点是, 德国人不能在第一阶段介入, 只能随着事态的发展, 以北约伙伴的姿态出现, 否则将在全世界引起一次反日耳曼浪潮, 甚至我们的盟国也会说: 德国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失败了, 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失败得更惨, 没有过几年又发动进攻了!”^[9] (第339-340页)

阿登纳政府坚持由西方三大国出面解决柏林危机, 与他对柏林地位的看法是分不开的。阿登纳政府认为柏林因其地位的特殊性, 属于四大国共同监管的范围之内, 联邦德国政府并无权参与协商谈判, 西方盟国作为柏林地位的保证国, 应该负起主要责任。关于这点, 施特劳斯认为: “我和整个联邦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即保障柏林的安全及其生命力是三个保证国的责任, 而非联邦共和国的责任。这符合我的看法, 即不论柏林的历史和象征意义如何, 它首先是美国的一个政治阵地, 然后才是德国的政治阵地。”^[6] (第339页)

(二) 阻止西方盟国对民主德国的承认

根据阿登纳的分析, 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迫使西方国家承认民主德国, 凡是导致在事实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动向和安排都毫无例外地遭到阿登纳的坚决反对。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8年11月14日给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代理人”理论, 即在通往柏林的公路和铁路线上, 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政检查人员和军事检查人员检查证件, 他们可以被看作是苏联占领当局的“代理人”^[7] (第343页)。美国的立场引起了阿登纳政府的震惊, 因为这与西方国家把联邦德国看成是德国人惟一合法代表的原则相违背^[8] (第31-32页)。受阿登纳委派, 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格雷韦会见了杜勒斯, 表达了联邦德国政府对于“代理人”理论的担忧。格雷韦认为, 代理人理论有两个弱点: 一是无论是对方或是自己的舆论界, 都可能把这种做法理解成让步的开始; 二是民主德国的检查机构将会不遗余力地否认自己代理人的身分, 并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具有主权国家政权的机构^[7] (第343-344页)。在联邦德国政府的敦促下, 美国政府对以代理人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应急计划进行了检讨。1958年12月11日, 美国代理国务卿赫脱在一次由艾森豪威尔主持的会议上说, 国务院决定放弃“代理人”理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阿登纳政府坚决反对这一理论^[9] (第361页)。

在是否承认民主德国问题上, 英国人则打算走得更远。1958年11月下旬, 一个提交给盟国的“工作人员一级”的英国文件声称, 西方与其让柏林遭受被封锁的危险, 不如准备好不仅与民主德国政府打交道, 而且最后承认它。这个文件一经泄露给联邦德国政府, 立即引起了阿登纳的不满。外交部国务秘书舍尔彭贝格被派往伦敦, 阐述联邦德国政府对于柏林问题的立场,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能给予民主德国任何事实上的承认^[10] (第61页)。在麦克米伦宣布访问苏联之后, 为了促使英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不要采取承认民主德国的步骤, 1959年2月11日, 阿登纳写信给麦克米伦, 在信中, 阿登纳希望麦克米伦在被苏联要求承认民主德国时, 要特别认真考虑到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因为“一旦西方盟国对东德予以承认的话, 整个外交形势就会改变, 特别就欧洲和联邦德国来说, 更是如此”^[11] (第401页)。英国政府虽然为了与苏联达成维持柏林现状的协议而倾向于在事实上承认民主德国, 但正是在阿登纳的反对下, 没有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就承认民主德国问题让步。

不能给予民主德国任何形式上的承认, 一直是阿登纳政府处理德国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关于这点, 艾森豪威尔有很正确的认识: “默认在东德的格罗提渥政权对于康拉德·阿登纳说来可能是政治上的灾难, 因为在迅速地复兴西德, 使它坚定地勇敢地站在西方哲学一边等方面, 阿登纳历来要比任何其他人都肩负有更大的责任。”^[12] (第371页)

(三) 要求在与苏联的谈判中缩小谈判范围

阿登纳认为, 在一个大的范围内与苏联进行谈判, 必然会造成对苏联的广泛让步,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阿登纳政府要求美国在与苏联进行的试探性谈判中, 尽量缩小谈判范围。

为了向美国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阿登纳在1961年11月20—22日访问了美国,与肯尼迪举行了会谈。由于肯尼迪政府也力图孤立地搞一个有关柏林的、不属于整个德国问题范围内的协定,美德在缩小谈判范围上取得了一致。双方认为,应该争取一个有限的柏林协议,并继续为此目的而同莫斯科进行探索性的会谈。格雷韦认为:“这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根据,可以防止别人牺牲我们而在欧洲安全、裁军以及承认现状等方面慷慨地作出让步。”^[7](第506页)

但美国并没有按照与联邦德国政府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事。1962年4月9日,美国向联邦德国政府提交了若干文件,这些文件内容是美国准备向苏联提出谈判的新建议,包括:两德建立各种联合委员会加强接触;禁止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承认现有边界;为柏林建立一个国际通道机构^[13](第60页)。美国要求联邦德国政府在48小时内就这个建议表态。这一新建议使得波恩“不仅因为这种最后通牒式的期限,而且也因为建议的内容而陷于震惊”^[7](第535页)。阿登纳立即召开所有的联邦德国政治领袖进行商议,这一新建议的内容很快被透露给新闻界,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联邦德国报纸对肯尼迪政府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联邦德国政府通过这次有意“泄密”事件,如愿地阻止了美国政府按照原计划在4月16日将这个新建议提交给苏联驻美国大使的打算,制止了美国在对苏谈判中扩大谈判范围。结果,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基本上就限于一般性问题。格雷韦评价说:“一九六二年四月的大泄漏’也是一次有目的的失密。如果有目的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目的,因为它已迫使肯尼迪改变了方针。”^[7](第532页)

阿登纳政府要求西方盟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尽量缩小谈判范围,表现了它对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不信任。为了避免美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苏联达成妥协,阿登纳政府宁愿美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不涉及到整个德国问题以及欧洲安全体系问题,以“争取一个范围狭窄的柏林协定,这个协定要尽可能只涉及到一旦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签订的和约生效,从而使区间边境的检查职能移交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员之后柏林通行的方式问题”^[7](第499页)。

到1962年10月,西方三大国与苏联之间在柏林问题上由于立场相差太远,已经没有达成妥协的可能性。第二次危机在没有达成妥协的情况下,渐渐趋向消退。1963年1月,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要结束这场危机,持续5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宣告结束。

三

正是由于与盟国之间在解决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从危机一开始,阿登纳政府与盟国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出来,而阿登纳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在国外,西方盟国认为阿登纳的立场过于消极。肯尼迪说,波恩老闹别扭,阿登纳和他周围的人没完没了的猜忌狐疑,这使他日益迷惑不解^[13](第28-29页)。从波恩老是听到对美国建议的抱怨和消极反应。在国内,阿登纳的政策则被指责为太软弱。施特劳斯认为:“如果说联邦共和国后来发展可以归结于什么事件的话,那就是这场危机,就是柏林墙的修建,就是阿登纳的软弱反应,就是对盟国的失望。”^[6](第343页)

阿登纳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所采取的政策,虽然遭到国内外的诸多批评,但笔者认为,阿登纳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就其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取得了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正是由于阿登纳在危机期间,坚定的反对以牺牲联邦德国利益为代价与苏联达成妥协,才使盟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不敢作出太多的让步。阿登纳的传记作者施瓦茨认为,在整个危机期间,虽然关于解决柏林和德国问题,有很多提议和方案,但只要是联邦德国坚决予以反对的,都没有达成协议^[14](第749页)。即使西方大国愿意就解决柏林问题向苏联作出让步,也要考虑到联邦德国政府是否接受这种让步。正如阿登纳所说:“没有我们的同意,决不允许商定与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它的领土等有关的措施。”^[3](第129页)肯尼迪认为,联邦德国对其前任政府的德国政策实际上拥有否决权。在他上台后,试图改变“过去杜勒斯把这位总理当作我们的主要欧洲顾问的策略”^[15](第387页)。但很快,肯尼迪发现这样做是

行不通的,肯尼迪认识到,“他不能拟定西德人认为是出卖他们的任何解决办法”。于是,肯尼迪又转向阿登纳,听取他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的意见。从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肯尼迪得出了一个教训:“强使德国人和其他盟国接受怎么也不会是真正可以谈判的解决方案,是愚蠢的做法。”^[15](第424-425页)

第二,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被搁置起来,这正是当时联邦德国政府所希望的。阿登纳所奉行的是与西方结盟的政策,这一政策具体到德国问题上,就是依靠西方阵营的强大和与西方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来达到重新统一的目的。虽然阿登纳对统一有着坚定的信念,但也有现实的考虑,他认识到,德国的重新统一只有在大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随着两个德国分别加入东西方阵营并成为各自阵营中重要的一员,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在冷战对峙下,变得越来越渺茫。在美苏对峙的冷战环境中,德国归于任何一个阵营都会遭到另一个阵营的强烈反对。而在阿登纳的头脑中,在两极体系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也是不可接受的。他担心,如此,“一个统一的德国,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取得堪与今天的芬兰相比拟的地位”。格雷韦认为,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与其匆忙的来谈判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不如“设法使德国问题悬而未决并避免产生妨碍恢复统一的任何规定和放弃权利的做法”^[7](第394-395页)。对于联邦德国来说,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就实际政策来说,对我们的处境作出这样评价而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要竭力使德国问题尽量挂起来,并且避免作出不可逆转的承诺。”^[7](第398页)

阿登纳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效,与以下原因是分不开的。

首先,联邦德国存在着脱离西方的危险。联邦德国在1955年加入北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西方大国承诺在德国问题上给予阿登纳政府支持。如果西方大国从这个立场上后退,必然会让以与西方结盟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阿登纳政府无法立足,而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一度曾经主张脱离西方阵营而走中立化的道路,这样的前景让西方大国不能不有所警惕。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担心,如果对苏联作出太多的让步,例如承认民主德国,将会导致联邦德国脱离西方的危险。对此,肯尼迪有清醒的认识:“苏联尽可以保持德国目前存在的分裂状态,但休想说服我们赞同将这种分裂合法化并由此来削弱我们同西德和他们同西欧的联系。”^[16](第328页)而一个脱离了西方的联邦德国就会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变成和平的威胁。

其次,美国政府不想单独同苏联就柏林问题的实质进行真正的谈判。虽然美国和苏联就解决柏林问题进行过多次会谈,但据阿登纳派往美国的特使比伦巴赫观察,美国政府更愿意先与苏联进行几次试探性会谈,然后在内部就具体的谈判取得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一致同意,对外则尽快地同苏联继续举行四大国谈判。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由于美国单方面的行动而损害与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关系,从而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存在受到危害。“这是联邦德国的机会所在,如果联邦德国坚定而得体地加以利用,就有希望阻止美国方面在东、西方谈判中作出危险的让步。”^[17](第58页)

最后,出于促进法德关系的考虑,戴高乐对阿登纳政府采取了大体上支持的政策。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上台后,他的外交政策重点是加强法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为此,就要取得联邦德国的合作。第二次柏林危机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赢得联邦德国友谊的机会。从危机一开始,法国就表示了坚决不在柏林问题上让步的立场。这一立场与美国、英国相比,要强硬得多。法国对联邦德国的支持,让阿登纳很满意。在巴黎召开的最高级首脑会议因为U-2事件而流产后,阿登纳写信给戴高乐,感慨地说:“由戴高乐将军主持巴黎的会议,我多么幸运啊!多亏他个性坚强有魄力,西方国家才避免作一次首先要德国付出代价的重大让步。”^[9](第222页)柏林墙修筑后,美国和英国主张与苏联进行谈判,而法国反对举行任何谈判。法国与美英之间的分歧,对联邦德国是有利的。格雷韦对此评价道:“这种力量的对峙,成了我们得救的一条出路:要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孤立,几乎无法顶住美英方面那种愿意作出广泛让步的势头。”^[7](第474页)

总而言之,阿登纳政府主要依赖西方三大国来出面解决第二次柏林危机,但这种依赖不是唯唯诺诺,而是要求盟国在与苏联谈判过程中,先与联邦德国进行密切磋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否决权。正是在阿登纳政府的努力下,阻止了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 and 英国牺牲联邦德国

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 [1] 德里克·W. 厄尔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2] 吴友法. 冒险、失败和崛起——二十世纪德国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 [3] [德] 康拉德·阿登纳. 阿登纳回忆录 1955——1959(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 [4] [英] 哈罗德·麦克米伦. 麦克米伦回忆录(四)——乘风破浪[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5] [法] 夏尔·戴高乐. 希望回忆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6] [德] 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回忆录[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
- [7] [德] 威廉·格雷韦. 西德外交风云纪实[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 [8] Schick, Jack. The Berlin Crisis, 1958—1962[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 [9] 石 斌.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0] John P. S. Gearson. Harold Macmillan and the Berlin Wall Crisis 1958—1962: The Limits of Interests and Force[M]. Ipswich, Suffolk: The Ipswich Book Company Ltd., 1998.
- [11] Steininger, Rolf. Der Mauerbau: Die Westmaechte und Adenauer in der Berlinkrise, 1958—1963[M], Muenchen: Olzog, 2001.
- [12] [美]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7.
- [13] [德] 维利·勃兰特. 会见与思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4] Schwarz, Adenauer, Hans-Peter. Der Staatsmann, 1952—1967[M].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91.
- [15] [美] 西奥多·索伦森. 肯尼迪[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 [16] [美] 小阿瑟·M·施莱辛格. 一千天: 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 [17] [德] 库尔特·比伦巴赫. 我的特殊使命[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桂 莉)

Adenau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3)

YE Xiaodong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E Xiaodong (1976-),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Germany and world history.

Abstract: During the Berlin Crisis, the Adenauer Administration held different views over eliminating the crisis from Western Alliance, especially from US and UK. The Adenauer Administration mainly played its role in eliminating crisis through effecting on Western Alliance's decision-making, and actually had a veto over the ultimate policy of Western Alliance. The chief goal of the Adenauer Administration was to keep Western Alliance from reaching an agreements with Soviet at the cost of the profi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Germany. In this sense, the Adenau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the Berlin Crisis had succeeded.

Key words: Adenauer Administration; Berlin Crisis; foreign policy